

臺北帝大的南方調查資料

文·圖片提供／葉碧苓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）



▲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。（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1937年，日本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；1941年底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臺灣成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中心。在此種時局氛圍下，臺北帝國大學的「南方」學術研究，亦積極配合對外擴張的政治目標。

1938年7月，臺北帝大配合南支派遣軍廈門大學接收事宜，翌年2月起隨著廣州復原建設工作，進行以廣東地區為主的華南調查；1939年2月，日本軍隊進駐海南島之後，臺北帝大也曾先後進行兩回的學術調查活動；1941年協助日本外務省推動南方調查計畫；1942年主動提出對海軍軍政地區西里伯斯島（Celebes）進行學術調查計畫等。其中，尤以兩回的海南島學術調查活動留下可觀成果。

對學術未知地的海南島進行科學調查

1939年2月，日本軍隊進駐海南島後，臺北帝大即以該校為日本「帝國南方學術之殿堂」，積極爭取前往「位於東南亞南端學術上未知地的海南島進行科學調查」。臺北帝大總長三田定則（1876-1950）與各學部長商討之後，決定以理農相關學科為範圍，對海南島進行科學調查。

1940年底，以理農學部長早坂一郎（1891-1977）為首，組成「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團」，其下分生物學、農學、地質學三班。生物學班針對海南島的動物（浮游生物、貝類、蜻蛉、鼠類）、植物（植物採集、植物目錄、植物相）等進行調查；農學班則對海南島的土壤、畜產、農業昆蟲、林業、食品、農作物，以及海南島原住民黎族進行研究調查；地質學班則關注岩石、礦物等觀察。

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日本快速席捲東南亞歐美各國的原有殖民地，因此急需熱帶南方的統治經驗。1942年2月，臺北帝大再組織「第二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團」，分成經濟與民族關係、理農學、農藝化學三班，一方面補強第一回調查的不足，一方面擴大前次研究範圍。經濟與民族關係班，針對海南島三亞回教徒、漢人身體人類學與寺廟神祈進行調查；理農學班，則以海南島氣象、農作物、森林與造林（橡膠、油桐、粟、松）、鼠類、農業昆蟲等進行深入研究調查；農藝化學班，則對海南島的植物纖維資源、單寧及油脂、糖業等進行調查。

開設南方人文研究所 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

處於南方研究和學術動員雙重需求的時勢和戰局之下，臺北帝大進一步於1943年3月增設兩所南方研究機構，一為以文政學部教授為中心的南方人文研究所，一



▲《南方文獻目錄》（東京：日本拓殖協會，1942年，封面）

▲《臺北帝國大學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》（臺北：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，1942年，書名頁）

為以理、農學部教授為中心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。南方人文研究所由土俗人種學家移川子之藏（1884-1947）擔任第一任所長，該所研究項目涵蓋臺灣產業與南方圈產業之關聯、華僑、南方移民，以及南方宗教、諸民族之風俗習慣等相關研究。另有編纂「南方文化（百科）大辭典」、「南方文獻目錄」等計畫。

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由蔗糖研究專長的濱口榮次郎（1892-1970）擔任首任所長，並於海南島榆林設置實驗所，由平坂恭介（1887-1965）出任實驗所所長。該所研究項目包括南方地域之棉及纖維（絹、紙）、燃料用酒精（丁醇、無水酒精、甲醇）及溶劑（丙酮），以及石油成分構造分析與確立之研究等。榆林實驗所，則負責海南島的熱帶農作物、有用植物、土壤生產率、病蟲害、地下資源、有害之海生生物、有用生物等調查研究。

整理出版「熱帶科學研究叢書」 與「南方大系叢書」

財團法人國際日本協會有鑑於臺灣為日本南方研究的中心，也為南方知識的寶庫，遂自1942年9月起與臺灣學界合作，聘

請以臺北帝大為主的學者撰稿，擬自1943年起選定臺灣學界足以誇耀世界的研究業績約五十種，逐次以單行本方式刊行，預計以五年時間完成，彙輯為「熱帶科學研究叢書」，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建設基石。

1943年5月，臺灣總督府召開「南方委員會」幹事會，會中決議將臺北帝大、研究所、試驗場等單位長年蒐集的南方關係資料予以活用，以三年為期，刊行學術論著「南方大系叢書」。一方面作為日本在臺灣「施政五十週年紀念事業」之一；一方面則活用臺灣的特殊地位，使這些南方知識能成為日本未來對南方諸地域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各部門施政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。但囿於戰爭因素，上述兩大叢書的刊行、編纂，似乎僅止於計畫階段，最終未見任何成果刊行。

總之，臺北帝大的學術研究為配合日本南進政策，而以「南方研究」為主流，累積豐碩的業績，成為望重一方的知識權威。此一學術成果，在特殊的時空環境下，或在臺灣總督府的施政參考方面，或在南方知識作為總督府業績的誇耀，以及普及推廣方面，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。☞



▲「熱帶科學研究叢書」刊行趣意（《國際評論》，第7卷第12號，1942年12月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古籍研究資料庫）。